

通向斋月战争之路

[埃及]穆罕默德·海卡尔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通向斋月战争之路

〔埃及〕穆罕默德·海卡尔著

上海《国际问题资料》编辑组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Mohamed Heikal

The Road To Ramadan

Collins, London, 1975

根据伦敦柯林斯出版公司1975年版译出

通向斋月战争之路

〔埃及〕穆罕默德·海卡尔著

上海《国际问题资料》编辑组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0.125 字数 189,000

1976年12月第1版 1976年1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1171·196 定价: 0.81元

内部发行

译 者 的 话

一九七三年十月爆发的第四次中东战争，以阿拉伯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光辉胜利载入了埃及和阿拉伯的史册。这次战争粉碎了以色列“不可战胜”的神话，打破了超级大国强加的“不战不和”的局面，显示了阿拉伯人民团结战斗的巨大力量。穆罕默德·海卡尔的《通向斋月战争之路》，就是一本描述这次伟大战争前后经过的历史性著作。在本书中，海卡尔详细记述了自一九六七年六月战争失败以来，埃及政府为准备收复失地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埃及同美苏以及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十月战争从秘密计划到实际展开的整个过程以及作者对这次战争的特点和石油武器的个人看法。作者还以耳闻目睹的事实，生动地叙写了战前和战争期间的一些插曲，从而勾画出一些阿拉伯国家领袖的性格特征以及苏修头子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人的嘴脸。特别是作者以丰富的第一手材料，揭露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对埃及的渗透扩张和控制的野心以及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中东地区进行的激烈的争夺。

《通向斋月战争之路》原书是作者用英文写成的，一九七五年六月在英国伦敦出版。埃及《金字塔报》曾将该书部分章节译成阿拉伯文，在该报连载。

中译本是根据英国柯林斯出版公司一九七五年版本译出的。由于时间短促,水平有限,错误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

前 言

在这本书里，我尽量把我在一九七三年十月战争期间所知道的和我在六年内所知道的一系列导致这场战争的事情作一番忠实的报道。当然，由于我决不可能什么事情都知道，因此，我对问题的分析是不全面的，也可能是错误的。但是我作出了最大的努力来描绘出一幅真实而公正的画图。我一直抱有这样一种意图，那就是这幅画图不应该是仅仅反映埃及的情景。我倒是希望尽可能从阿拉伯世界这个更广泛的角度上来描绘这幅画图。同时，我也没有忘记，阿拉伯世界又仅仅是这整个错综复杂的国际场景的一部分。

且不谈十月战争——“斋月战争”——中可能存在的暂时的得失，这场战争的结局预示了下阶段必然要发生的冲突。阿拉伯人显示了他们的力量，然而没有能妥善地加以利用。以色列人眼看到他们自己的根本弱点，但是惊恐地掉头不顾，竭力想装出这种弱点并不存在的样子。外部世界则倾全力于平息这场危机，而不是尽力去追溯危机的根源。继战争之后而出现的停火的主要缔造者亨利·基辛格，则把这场危机看作主要是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关系的一次演习。时机已经坐失，相互之间又缺乏了解，从这一切得出的唯一结论是，另一次战争必然还要发生。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奇袭	1
第二章 纳赛尔最后的立场	44
1. 失败的后果	44
2. 同阿拉伯国家的接触	55
3. 巴勒斯坦人加入斗争的行列	63
4. 利比亚政变	71
5. 买一颗原子弹	80
6. 拉巴特首脑会议	81
7. 在莫斯科的危机	88
8. 罗杰斯的倡议	98
9. 第二次访问莫斯科	101
10. 接受罗杰斯的倡议	103
11. 开罗会议	106
12. 纳赛尔之死	113
13. 葬礼	115
第三章 萨达特驾驭风暴	126
1. 早期的外交接触	126
2. 阿里·萨布里集团的垮台	135
3. 巴勒斯坦人和苏丹人	155

4. 在苏联大使馆的宴会上·····	160
5. 兰道波洛事件·····	165
6. 同罗杰斯的最后一次会谈·····	170
7. 进入一九七二年·····	173
8. 和苏联人之间发生了更多麻烦·····	180
9. 破裂·····	185
10. 利比亚·····	209
11. 同美国的关系·····	226
12. 走向战争的压力·····	232
第四章 战争·····	236
第五章 核戒备·····	278
第六章 一场新型的战争·····	294
第七章 石油·····	299

第一章 奇 袭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二日，星期三上午，八名埃及军官和六名叙利亚军官一个个地从亚历山大的军官俱乐部前往设在蒂恩角王宫的海军司令部。叙利亚人是一、两天前从大马士革来的，他们个别地办理报到手续，然后混杂在埃及人和来自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军官以及俄国技术人员中间，这些俄国技术人员惯常到这个俱乐部来，特别是到了每年盛夏休假季节高潮的时候更是如此。他们全都穿便服，因此没有理由会引起人们对他们的特别注意。

在海军司令部的一个房间里，中央放着一张长桌。桌子的一边居中坐着国防部长艾哈迈德·伊斯梅尔将军，他的对面是同他对等的人物——叙利亚国防部长穆斯塔法·塔拉斯将军。在他们两旁分别坐着两国武装部队的高级军官：两国的参谋长、作战部长、情报局长、海军司令、空军司令和防空司令。但是，最后这两个职务在叙利亚是由一位军官同时担任的，因此，叙利亚只有六个人对埃及的七个人。围坐在长桌旁的第十四个人仍然是一位埃及人——巴哈丁·诺法勒将军。他是埃叙联合作战司令部的参谋长；他的职务说明了其他这些人出席这次会议的目的。说得简单一些，围着长桌坐的都是埃叙联合司令部的军事首脑人物。

他们到这儿来的目的是对一项计划进行最后的润色。根据这项计划，埃叙两国军队将在这年秋天的某个时候，对驻在被占领的埃及领土西奈和叙利亚领土戈兰的以色列军队同时发动一场进攻。关于发动这场进攻的计划工作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开始——在一九六七年的失败以后就立即以这种或那种形式着手制定了。随着埃及希望同一个伙伴或者几个伙伴一起干的变动，这项计划曾采取过多种不同的形式。只是在一九七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成立了埃叙武装部队联合司令部之后，才采取了最后的这种形式。在此以前，利比亚曾积极参与这项计划的制订工作。但是后来情况表明，利比亚的卡扎菲总统在发动进攻的方针路线方面同埃叙存在着根本的思想分歧，于是另两位总统就决定撇开他继续进行准备。

为了保证不走漏一点风声，采取了最严密的预防措施。十四位军官开会的房间检查了一次又一次，以防有人可能窃听。任何电子器材都不得带入会场。任何人都不得作记录。只有一位军官是例外，那就是埃及的作战部长阿卜杜勒·加尼·贾马斯将军。他用铅笔作记录，然后再复制两份：一份给埃及参谋长萨阿德·沙兹利将军，由他转交给安瓦尔·萨达特总统；另一份给叙利亚参谋长优素福·沙库尔将军，由他转交给叙利亚的哈菲兹·阿萨德总统。离开会议室后，任何军官都不得用书信或电话同另一位军官联系，他们之间要交换意见，必须而且只能通过口头交谈来进行。

会议继续进行了六天，因为总的计划虽然早在四月

就已商定，但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当军官们最后在八月散去时，大多数叙利亚军官从亚历山大乘轮返回拉塔基亚，其余则乘飞机回国。尽管他们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审议，但到散会时，有两个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只能提请两国总统作出决定。这两个问题都与选择发动进攻的确切时机有关——那就是发动进攻的日期和发起进攻的时刻。

计划的制订者们提出了两段可供选择的时间——九月七日至十一日之间，和十月五日至十日之间。他们对第一段时间始终不太感兴趣。但是他们还是把它保留了下来，以备万一遇有计划制订者所未觉察到的重大政治原因而可能适宜于提前发动进攻时，有一个选择的余地。然而，他们在选择进攻时机方面一致同意作出的一项决定，实际上排除了在九日发动进攻的可能性，因为这项决议规定进攻要有二十天的临战时期。这样，尽管选定确切日期的责任在于两国总统，实际上只能是一场十月战争了。此外，还有一点也影响到选择进攻的时间问题：叙利亚人要求给他们五天的特别临战时期，让他们有时间把在霍姆斯的那些炼油厂的石油运走。战争一打响，那些炼油厂几乎肯定会成为以色列人的轰炸目标。埃及人在一九七〇年的消耗战中已经懂得，轰炸一座空的炼油厂所造成的损失，相对来说比较小，但是如果油罐区储满了石油，那就能招致灾难性的破坏。叙利亚人的这个要求得到了同意，但后来却成了导致某种误会的一个根源。

至于战争应该在什么时候打响，埃及人主张在下午，

这样他们的军队就可以背着阳光攻过苏伊士运河去，而以色列人的眼睛则受着阳光的刺射。埃及人将有几个小时的日光可以渡河，接着又有六小时的月光，在这段时间里，浮桥可以架设完毕，然后，在后半夜漆黑的六小时里，装甲部队就能渡过运河。可是，叙利亚人却想在拂晓发动进攻，因为他们是向西进攻的，他们渴望背向阳光的心情不亚于埃及人。于是提出了几种折衷方案，例如，埃及人说可以让叙利亚人天一亮就动手，他们自己可以在下午接上去干。叙利亚人表示反对，因为这样一来就使它们有好几个小时不得不孤军作战，而且会破坏在两条战线上同时发动突袭的有利因素。埃及人接着又建议，他们在发动进攻那天的下午动手，叙利亚人可以在第二天拂晓开始行动。叙利亚人对此又表示反对，他们说这不仅同样会破坏奇袭的部分有利因素，而且从政治上考虑也是错误的，因为这会给人一种印象，仿佛他们行动迟缓，落在埃及人的后面。

在亚历山大进行这些讨论的时候，萨达特总统正在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叙利亚访问。他在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的停留，在很大程度上是该项精心设计的并已开始实行的迷惑计划的一部分，目的是要给人以一种印象：总统象埃及的任何其他人一样正在从事正常的活动。但访问叙利亚却有着重要得多的目的。在作出重大决议之后，两国参谋长就离开了这次制订作战计划的会议，把细节问题留给他们的部下去解决。塔拉斯将军立即飞回大马士革，萨达特总统正在那里访问。他把在亚历山大已

经解决的问题和那两个还没有解决的问题向萨达特总统和阿萨德总统作了汇报。萨达特总统和阿萨德总统一致同意发动进攻的日期不应定在九月，而应该是十月五日到十日这段时间的某一天。八月二十七日下午，萨达特总统返抵开罗。伊斯梅尔将军在机场迎接，并把联合参谋会议的情况向他作了更详细的汇报。他批准了他们所作出的一切决议，只是对临战期的时间表示异议。他认为，二十天太长了，十五天比较合适，而且也足够了。于是就作了修改。

接着，在九月的头三天举行了一系列会议。与会者有参加过在亚历山大举行的参谋会议的埃及军官，再加上准备攻过运河去的两个军的指挥官。这些会议向与会者说明了当前的形势，但是有关日期则未向与会者透露，并且强调指出任何情况均不得外传。

在九月三日的一次会议临结束时，沙兹利将军要埃及陆军情报局局长福阿德·纳萨尔将军就敌人对这次进攻可能作出的反应作出估计。纳萨尔的估计根据以下三方面的材料：第一，在以色列于五月份进行的军事演习以后所作的详细研究。这次演习，其用意显然是作为对当时埃军在这个地区集结后发出的一个警告：如果埃军企图横渡运河，必将予以歼灭；第二，已掌握的关于以色列军队当时在西奈的部署情况；第三，一般情报资料。

纳萨尔将军讲完以后，沙兹利将军提出一个问题，由此引起了长时间的热烈讨论。他问情报部门，有没有估计敌人到什么时候才可能发觉埃及的战争准备工作。他

得到的回答是：预计敌人在攻击开始前十五天就可能发觉。换句话说，临战期一开始，敌人就能调集后备部队。

这样，埃及司令部就遇到了一个起先看来似乎是无法解决的问题：如果百分之百的出其不意似乎是不可能做到的话，那末，第一批渡河部队就不仅将受到以色列正规装甲部队正面的全力冲击——这一点一直是预见到的——而且还要受到动员起来的以色列后备部队的强大压力。固然，可以采取一些办法加快架桥作业，使埃及装甲部队能比原计划提前渡过运河，但这也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因为桥梁可能遭到轰炸，而且无论如何也不能避免出现这样的局面，即步兵将在好几个小时内孤军作战，并且面临着——这几乎可以说是必然的事——被歼灭的危险。这个问题，直到大约过了十天以后，才找到解决的办法。为了能顶住以色列的正规部队，埃及司令部一直计划用世界上最好的可随身携带的防空导弹和反坦克导弹——苏制“斯特雷拉”式导弹和“马柳特卡”式导弹（西方称之为萨姆-7和萨格尔式）来装备第一批突击部队。现在，解除这个新的威胁的办法，就是给第一批八千人的突击部队以及尾随的几个步兵师提供大量导弹，数量远远超过原来的预计。为此，第一军——在发动袭击的初期将留在运河西岸，不渡过运河进入西奈——所有的“斯特雷拉”式导弹和“马柳特卡”式导弹几乎全部交出，转给了袭击部队。正是由于这最后一分钟的“超剂量”的武器配备，才使步兵部队顶住了。达扬将军后来承认，使以色列军队措手不及的不是这些武器的新颖，而是埃

及人在战斗一开始就能动用这些武器的巨大数量。

在九月三日的这次会议上，还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如果把迷惑计划的范围扩大，就可能把以色列发觉埃及的战备的时间由十五天缩短到四天或五天。伊斯梅尔将军认为，这样就足以保证获得成功，因为埃及司令部估计，以色列全国总动员约需五天至七天。当然，他认为如果能把这段时间再缩短些，比如说三天，那就更好了。此外，一般认为这次以色列的动员可能还要长些，因为正好赶上一连串的宗教节日和假日，这期间的高潮是赎罪日，况且还要为定在十月三十一日举行的以色列大选迅速进行准备。

会议决定，作为迷惑计划的一个部分，在准备一年一度的秋季演习的掩护下，完成最后的兵力部署。这次以“解放二十三号”为代号的演习，很早以前就已单独制订了计划。以色列情报部门必定知道这次演习的一切情况，因为天空中早就充满了同这次演习有关的各种无线电信号。因此，当最高司令部搬到被称为“十号中心”的地下掩蔽部（这次战役的作战司令部）时，第一件事情就是在指挥所四周的墙壁上挂满“解放二十三号”演习的地图。把积极参加“解放二十三号”演习的部队转入发起“白德尔^①”进攻（这是为埃及—叙利亚这次联合进攻所起的

① “白德尔”(Badr)系地名，在沙特阿拉伯麦地那城西南二十哩处。穆罕默德曾于公元六二四年在这里发动了一次奇袭，征服了不信伊斯兰教的麦加人。因此，萨达特把这次奇袭的代号称作“白德尔”，寓有圣战的意义。——译者

代号)的阵地,这是一件比较简单的事。

迷惑计划所包括的范围,自然比这还要广泛得多。仿效蒙哥马利在打阿拉曼战役以前的先例,研究迷惑计划是和制订作战计划同时开始的,而且是齐头并进的。迷惑计划包括军事、外交和情报等一切方面。部队在夜间运动到运河前线,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又在白天大模大样地撤回来(当然,到了夜里又重新返回运河前线)。在苏伊士运河西岸有一座很高的沙堤,这座沙堤从一九七二年年底起就开始兴建,花了三千万英镑。用意似乎是为了增强抵抗以色列进攻的能力,其实,它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隐蔽炮兵和坦克的集结。埃及和叙利亚的代表在不结盟会议、联合国会议和其他各种会议上高谈和平(这里必须补充一点:他们并不了解指示他们作这种发言的目的何在);与此同时,报纸和电台也大肆宣传埃叙热心寻求和平解决中东冲突的方法,并对巴勒斯坦游击队的好战言论和行动表示不以为然。

尽管迷惑计划取得了成功,然而,主要功劳却应归于那位变幻莫测的盟友——“幸运”将军。谁也没有奢望会碰上这样的好运气:十月初以色列的公众舆论几乎全部被奥地利政府的一项决定吸引住了。当巴勒斯坦游击队组织“闪电”的成员劫持了一列运送从俄国来的犹太移民的火车之后,奥地利政府下令关闭设在苏诺的难民营。另一个意想不到的好事是:一九七三年春天,以色列军事情报局局长亚里夫将军这个极端阴险狡猾的军官,被解除了职务,而由那位坚信埃及在任何情况下都无力发动进

攻的泽拉将军来接替他。另一件事也是很幸运的，九月十三日在大马士革上空发生了一场不幸的空战，在那场空战中以色列击落了十三架叙利亚飞机，以色列人从这场空战中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这样就引起了极度紧张，人们担心叙利亚人可能会进行反击，因而在真正的战斗开始以前把自己搞得精疲力尽。实际上，他们确实在前线集结部队，埃及也把一些部队向前线调动，但是，这只是“解放二十三号”演习的一部分。埃及甚至还发布了半动员令，让一些后备部队也能参加预定在十月一日至七日进行的“解放二十三号”演习。毫无疑问，所有这些同那场在叙利亚的空战以后所发生的事有关的讯号都被以色列人截获了，而在转移以色列人对真实威胁的注意力方面起了一份作用。另外，完全出于意外的巧合，还发生了一件虽然很小却很重要的事。大约就在那个时候，一家美国公司签订了一项铺设一条石油管道的协定，管道的南端以苏伊士湾的阿达比亚为终点。如果运河前线打起仗来的话，那里肯定处于作战区域之内。这件事被视为埃及是盼望有一段较长的和平时期的又一个迹象。

美国人后来对埃及说，他们在五月就已经知道了“白德尔”计划，可是当时他们并不相信。毫无疑问，这个计划竟然付诸实施，使他们同任何人一样大吃一惊。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在最近那几个月里，他们在埃及进行了日益频繁的、集中在军事方面的情报活动。到了九月，人们感觉到他们这种间谍活动达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由于埃及和美国在一九六七年断绝的外交关系尚未恢复，他